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于学军

一. 前 言

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既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因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环境中,这必将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挑战。然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较长,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人口转变会经历一个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两部分负担人口比例同时相对较低的阶段,即“人口机会窗口时期”。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的原因、过程、趋势和后果,在制定未来的社会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会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因此,我们应从实际工作着手,切实将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用新的发展观,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是 21 世纪的一场人口革命。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 1998 年 10 月 1 日国际老年人年发起日的献辞中所指出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大大超出人口学的范围,给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均带来重大影响”。然而,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不同,实现人口转变的方式和途径各异,因此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其所带来的相关问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特别是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已经成为三个“老年洲”¹。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 20%,即西欧的摩纳哥,而摩纳哥全国只有 3 万人,并没有代表性。包括摩纳哥在内,世界上共有 22 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了 15%。在这 22 个国家或地区中,除了日本以外,全部为欧洲国家²。

从整体上看,25 年后发达国家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15%上升到 20%左右³。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尚未完结。另一方面,由于生育水平下降速度出人意料,加之死亡率急剧下降导致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比发达国家更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尽管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但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还不高,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真正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正如许多人口学者指出,中国 20 世纪的人口问题是数量问题,而 21 世纪的人口问题除了数量问题外,更为严重将是结构问题。人们关心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尽管人们还不清楚哪些影响是积极,哪些是消极的。本文将结合中国未来 50 年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简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挑战和机遇,并提出应对挑战的建议。

¹ 见 PRB, 2003, World Population Datasheet.

² 见 PRB, 2003, World Population Datasheet.

³ 见 United Nations, 200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0 Revision, Volume I, New York, 2001.

二.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分析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 中国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人们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识没有分歧。大家都认为,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转变的必然。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的演变历史来看, 我国的人口先后经历了人口年轻化和人口老龄化两个历程, 见表 1。

表 1: 中国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

普查年份	各年龄组人口比重 (%)		
	0-14	15-64	65+
1953	36.28	59.31	4.41
1964	40.69	55.75	3.56
1982	33.59	61.50	4.91
1990	27.69	66.74	5.57
2000	22.89	70.15	6.96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而得。

表 2: 2000—2050 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预测 (中位方案) 单位: 万人, %

年份	0-14 岁人口		15-64 岁人口		65 岁及以上人口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2001	29969	23.48	88575	69.40	9083	7.12
2002	28956	22.54	90144	70.18	9353	7.28
2003	28244	21.83	91504	70.72	9643	7.45
2004	27467	21.08	93025	71.39	9808	7.53
2005	26582	20.26	94513	72.04	10094	7.69
2006	26318	19.93	95416	72.25	10336	7.83
2007	26190	19.70	96210	72.36	10553	7.94
2008	26128	19.52	96974	72.45	10746	8.03
2009	26112	19.38	97650	72.46	11001	8.16
2010	26166	19.28	98266	72.41	11268	8.30
2011	26257	19.22	98803	72.31	11582	8.48
2012	26371	19.17	99248	72.14	11961	8.69
2013	26531	19.16	99601	71.92	12347	8.92
2014	26742	19.19	99706	71.56	12877	9.24
2015	26969	19.25	99674	71.15	13452	9.60
2016	26976	19.16	99835	70.91	13978	9.93
2017	27031	19.11	99649	70.47	14732	10.42
2018	26912	18.96	99636	70.18	15418	10.86
2019	26754	18.78	99464	69.83	16226	11.39
2020	26553	18.59	99287	69.50	17028	11.92
2025	24803	17.21	99759	69.20	19598	13.59
2030	22564	15.60	98099	67.81	23998	16.59
2035	21696	15.00	93825	64.87	29110	20.13
2040	21771	15.14	89602	62.32	32397	22.53
2045	21441	15.15	87241	61.64	32862	23.22
2050	20296	14.68	84423	61.04	33578	24.28

资料来源: 见本书第二章, 张为民、徐 钢、于弘文、崔红艳, “人口数量与决策选择”。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到, 1964 年中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 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56%, 低于 1953 年的 4.41%。这一阶段,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但没有老龄化, 反而出现了年轻化; 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 由于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同时下降, 导致人口开始老龄化, 到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分别达到了 4.91%、5.57% 和 6.96%。从年龄结构的类型看, 1953 和 1964 年, 我国的人口基本上属于年轻型, 1982 年处于年轻型和成年型之间, 到了 1990 年时,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属成年型, 而 2000 年的中国人口跨入了老年型。

表 2 是以最新的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所做的中国人口预测, 与其它机构预测的结果略有差异, 但基本趋势非常类似。例如,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的预测表明,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2020 年和 2050 年将达到 1.69 亿和 3.24 亿, 比重为 11.63% 和 22.57%⁴。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表明,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2020 年和 2050 年将达到 1.66 亿和 3.32 亿, 比重为 11.50% 和 22.70%⁵。而我们的预测结果是,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2020 年和 2050 年将达到 1.70 亿和 3.36 亿, 比重为 11.65% 和 23.97%。这也说明, 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基本是明朗的。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龄化, 但各个时期的老龄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未来的 50 年间,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0—2020 年, 是缓慢老龄化期。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6.97% 上升到 2020 年的 11.92%, 20 年的时间仅上升 4.95 个百分点。第二阶段为 2020—2040 年, 是快速老龄化期。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 2020 年的 11.92% 快速攀升到 2040 年的 22.53%, 20 年的时间将上升 10.61 个百分点。第三阶段为 2040—2050 年, 是高峰平台期。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阶段, 但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趋于平缓, 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重将逐渐稳定下来。

根据国家社会通例,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7% 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和老年型国家; 达到 14% 以上则称为老龄社会和老年国家, 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一般以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 7% 增长到 14% 所用的时间来表示。以此标准测算, 日本从 1970 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到 1994 年进入老龄社会, 其间仅用了 24 年, 远远短于英国 (45 年)、瑞士 (50 年)、美国 (65 年) 和法国 (115 年) 等人口老龄型国家, 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⁶。

表 3: 中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比较

国家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特定值的年份和所需年数					
	达到特定值的年份			所需年数		
	7%	10%	14%	7-10%	10-14%	7-14%
中国	2001	2017	2028	16	11	27
日本	1970	1985	1994	15	9	24
英国	1930	1950	1975	20	25	45
瑞士	1935	1960	1985	25	25	50
美国	1945	1975	2010	30	35	65
法国	1865	1940	1980	75	40	115

资料来源: 中国的数据为本文预测结果, 其它国家的数据见 JARC, Aging in Japan, 2003.

⁴ 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2002 年, 《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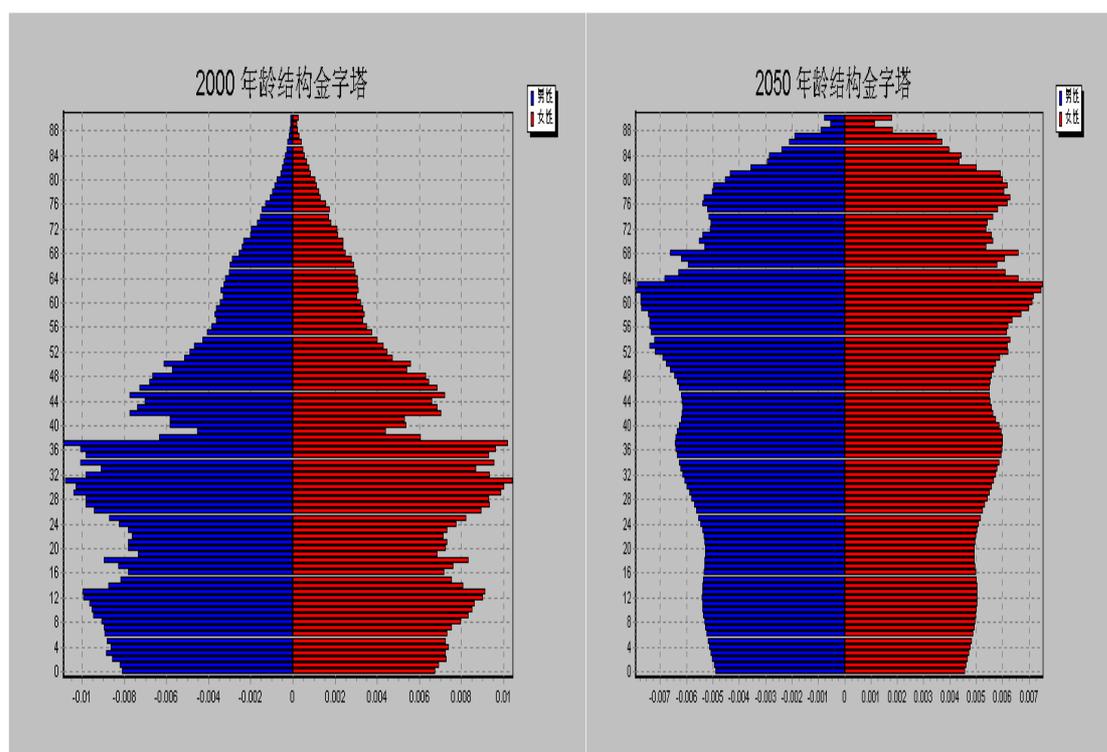
⁵ 见 United Nations, 200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0 Revision, Volume I, New York, 2001.

⁶ 见 JARC, Aging Japan, 2003.

许多学者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与日本相比，并声称中国不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老年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0%，日本用15年的时间，中国要用16年的时间，比日本稍慢一些；从10%上升到14%，日本用9年的时间，而中国要用大约11年的时间，也比日本慢一些。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日本用24年的时间，中国大约需要27年的时间。如果说日本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那么，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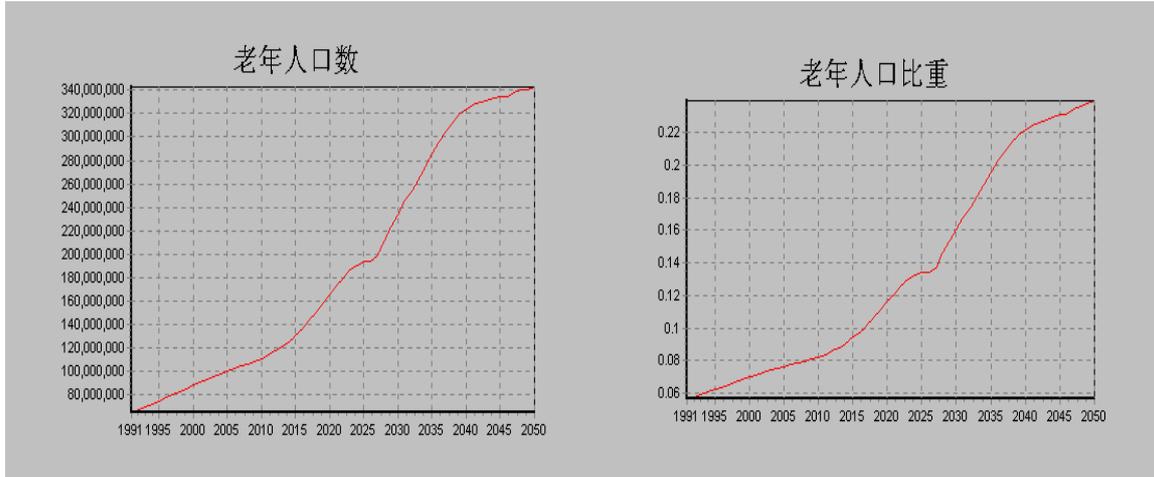
问题在于，日本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10%和14%的1970年、1985和1996年时的人均GDP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⁷。而中国2000年时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到2020年时，当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另外，1970年、1985年和1994年日本总人口为1.05亿、1.21亿和1.25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0.07、0.12和0.18亿，而中国目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0.9亿，2015年前后这一数字将超过1.3亿，那是的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日本总人口数。如此说来，中国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的问题更特殊：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总量大。因此，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图 1: 2000 和 2050 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比较



⁷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3,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Database, 2003.

图 2：1990 年—2050 年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动趋势



从图 1 和图 2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50 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都将快速攀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的内部也在老龄化，即逐步从人口老龄化走向人口高龄化。根据表 4 的数据推算，2050 年时的 60—69 岁、70—79 岁和 80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数分别是 2000 年时的 2.51 倍、3.81 倍和 8.18 倍。特别是到 2050 年时，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近 1 亿，届时的养老、医疗和照料的负担，将会使我们真正感到老龄问题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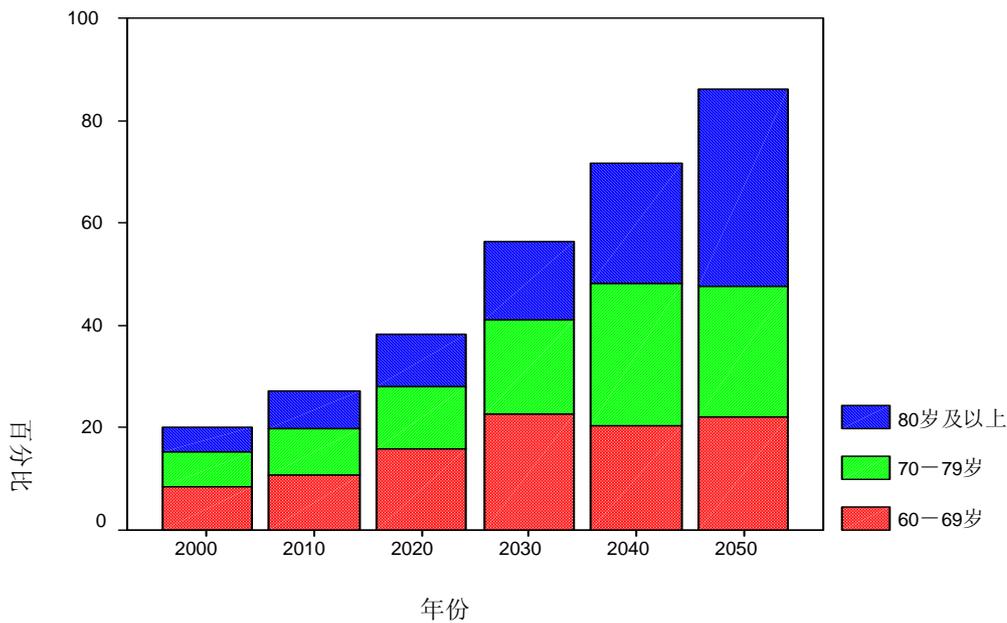
表 4：2000—2050 年间中国人口高龄化的趋势 单位：万

年份	60-69		70-79		80+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2000	3929	3732	1964	2191	457	745
2010	4938	4859	2601	2878	705	1086
2020	7133	7276	3421	3956	963	1543
2030	10105	10512	5007	6088	1364	2350
2040	9045	9574	7433	9182	1989	3789
2050	10015	10308	6691	8510	3170	6261

资料来源：根据本书推算。

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看，未来 20 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好时机，因为这一阶段的人口老龄化处于比较缓慢的时期，而且基本能自食其力的“小老人”的比重比较高。尽管 2020 年时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 2000 年增加 1 亿，但在增加的 1 亿老年人口中，60—69 岁的“小老人”大约占 2 / 3。此后，70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和“老老年”将快速增长，见表 2、表 4 和图 3。

图 3：2000—2050 年老年人口各年龄组比重变化趋势



三. 中国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人口革命。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然而，目前人们并不清楚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时间有多长，因为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仍在继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本文仅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作简要分析。

1. 人口老龄化与生产

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的结合为前提的。尽管现代经济学对生产要素定义的外延有所变化，但归根到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还是劳动力和资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对生产的影响贯穿一个生产过程的始终，即从生产要素的投入到产品的产出效率、产出数量、产出结构都要受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的影响。

资本问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最终将分割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为实现中国“三步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在 7%左右的高水平上。为了实现这一长期的发展目标，中国政府须将其国民收入的 30%用于资本积累和投资。然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投资资本积累的影响是消极的。因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导致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在于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国内资本不是国内投资的唯一源泉，国际资本流动也是国内投资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吸引国外资金是解决国内资本积累不足问题的另一有效途径。

储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心储蓄问题，是因为国内储蓄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又对储蓄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储蓄

之间的关系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争论也较大。但一般认为，由于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因而他们的储蓄率也将下降。而且，老年人退休后还要动用过去的储蓄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不利于储蓄率的提高。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老老人”的增加时，这一影响更为突出。

劳动力问题。在未来的 50 年，我国的劳动力数量是先增后减，但始终占总人口的 60%至 70%。从绝对数上看，2000 年后，基本上都在 8.5 亿以上，特别是在 2010—2020 年的 10 年间，劳动力人口接近 10 亿。因此，我们不必为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影响而担心。从理论上讲，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无疑对缓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压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如何向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劳动力人口自身的老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问题。

2. 人口老龄化与分配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经过生产过程而产出的财富，必须经过分配才能进入消费。因而，分配是联结生产和消费、交换的重要环节。任何一个人，都要以一定的形式参与财富的分配过程。但是参与财富分配的人不一定是财富的生产者。人口老龄化之所以对分配有影响，是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会改变未成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和总人口抚养比的构成。

宏观分配：一般认为，支付老年人口的费用占到国民收入的 10%为“警戒线”，超过了这一警戒线将给国家财政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困难。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的经验就是前车之鉴。考虑到下列因素的作用，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的费用超过 10%的时刻会大大提前：

(1)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将持续地上升。

(2)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渠道进行分配的比例将逐渐扩大，而通过家庭进行分配的比例会逐渐减小。这就会改变过去一些养老费用不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局面，从而扩大养老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3) 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从“家庭供养为主，社会供养为辅”的模式，转向以“社会供养为主，家庭供养为辅”的模式。随着今后我国的供养方式的改变，家庭供养的比例会缩小，社会供养的比例会加大，要求政府增加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投入，增加消费基金的比重。

(4)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的不改善，为使老年人口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需增加老年人口的福利项目，扩大对老年人口的福利供给，这会使政府用于老年人口身上的费用进一步提高。

微观分配：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家庭中未成年人的数量会减少，而老年人的数量会增多。这种家庭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对家庭的收入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对家庭分配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家庭经济收入分配和家庭消费水平方面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家庭其他成员时间分配方面的影响。在我国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医疗、康复和护理还远远没有社会化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康复和护理工作主要要由家庭来承担。对于劳动力人口来说，时间就意味着收入，时间的损失意味着收入的损失。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中中风后遗症、心衰和骨关节病变对康复及长期护理的

需求会逐渐增加，从而使家庭的收入数量和分配方向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丧失生产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来说，他们很可能要拿出很多时间，而且必须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赡养父母。

代际分配：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活动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一生中的经济行为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人的生命周期总是要从未成年人年龄阶段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小于消费；接着是劳动力年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大于消费；最后是老年年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再次小于消费。为了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处在生命周期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人口需将其净产出（产出和消费之差）的一部分分配给处在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未成年人和第三阶段的老年人。无论在何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生命周期三个阶段中的这种分配关系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这种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通过家庭分配、通过公共部门分配或通过市场分配。无论以那种方式分配，我们都统称为代际间的分配。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时，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有所变化，这会导致代际间分配量的增加或减少，导致有些年龄组的人受益，而有的年龄组的人受害。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代际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3. 人口老龄化与交换

交换是指市场商品的流通，包括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它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它将生产和由生产所决定的分配同消费联系起来。市场的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费品市场需求是市场活动中实现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市场的消费需求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是人口的年龄构成。人口的年龄构成的不同会形成对消费品需求在量上和质上的差异，因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有不同数量和结构的消费品需求，其支付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必将对交换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

商品结构：人口老龄化对市场商品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作为产品的生产单位和供给者，厂商要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来调整消费品的生产。人口是消费品市场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是市场需求的提出者和原动力。我国的厂商并没有完全注意到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和对消费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消费品市场，数量充足、种类齐全，而老年人口的消费品市场却仍待开垦。

商品需求：对商品消费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交换市场中实现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它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能力的大小，即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小。而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小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少。人口老龄化之所以对消费需求的数量有影响，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口的经济地位下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自然就相对较小。因此，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老年人口较多的社会里，其总人口的购买力会下降，对市场上的消费品的需求就会下降。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老年人口的购买力固然较低，但是，未成年人口的购买力则更低，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收入。因此，在考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品需求时，同时也要考虑到未成年人口的变化情况。

商品供给：如上所述，生产决定交换，只有经过生产过程产出商品后，才能拿到交换市场上进行交换。因此，生产的状况直接决定着交换的供给状况。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结合，也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其数量、质量以及他们的部门构成、行业构成、职业

构成、文化技术构成、地域构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生产，从而影响交换市场的供给。交换市场供给的数量、质量和品种都与劳动力人口的状况有关。

商品市场：交换市场体系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中至关重要，市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作用尤其重要。市场体系是否完善，运转是否正常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老年人口在交换市场上对商品和服务有其特殊的需求。因此，作为市场交换主体的人口的老龄化对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直接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交换市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很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和完善交换市场体系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同时也要注意到注意人口老龄化的事实及其对市场供求的影响。例如，在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时，要注意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适时地设立必要的险种，以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在建立股票市场时，要考虑到发达国家股市上的“散民”多为老年人口的事实，注意老年人口的投资心理和偏好；在建立医药市场时，要注意到人口老龄化及人口疾病发生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医药、卫生器械、保健服务的供给结构，等等。

4.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

消费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四个环节之一。如果说生产是这一过程的起点，那么，消费则是这一过程的终点。一般说来，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起决定的主导作用，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对生产也有反作用，会延缓或加速生产的发展。消费不仅使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最后完成，而且它还还为生产创造出更多的新的需求，从而促使生产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需求创造了生产供给。

人的一生都要进行消费，但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未成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不同的。因此，一个社会的人口中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不同，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未成年人口的比例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的比例将逐渐上升，而成年人口的比例则基本上保持不变，因此，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模式将对我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

消费负担指数：在我们所回顾的有关文献和我们的实证研究中，老少消费比一般在 1:0.3~1:0.7 之间波动。这里，我们采用“负担人口消费指数”来说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费负担在未来的变化状况问题。根据这一指数，连同我们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趋势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 2000—2050 年中国负担人口消费指数的发展变化状况：尽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未成年人口的消费负担指数是在下降的，但是却没有老年人口的消费负担指数上升的快。特别是 2010 年后，由于未成年人口的消费负担指数下降的速度非常缓慢，而老年人口的消费负担指数却加速上升。这使我国总的负担人口的消费指数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发展。这一结果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1) 尽管 2000—2050 年间，我国总人口的抚养比会出现“U”形的变化，即先下降，后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总人口的消费负担会有所减轻。(2) 人口老龄化不仅会改变我国的消费结构，而且会使我国总人口的消费负担加重，它要求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扩大。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消费基金的扩大，意味着积累基金的减少，意味着积累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率的下降，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

消费基金水平：过去，人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数量对国民平均消费基金

水平的影响，这里的一个假设是所有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将总人口分为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均消费基金水平的下降。（2）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要保持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原有的人均消费基金水平，必须扩大消费基金的总额。（3）要提高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基金水平，我们所能求助的只能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显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社会负担的加重，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基金需求要不断增长，从而使积累基金的比重将受到影响。假定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的话，那么，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的变化，势必要影响，甚至制约到人均消费基金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微观消费水平：人口老龄化对微观家庭的消费影响更为直接：（1）家庭人口老龄化会使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从而影响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2）家庭人口老龄化，即老年人口的增加和未成年人口减少会使家庭总的消费负担水平上升，从而影响家庭人均消费水平；（3）家庭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改变家庭的消费结构，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消费偏好。特别是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中国来说，这些影响尤其明显。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对家庭的消费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间接的影响。

5.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社会保障

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经济的关系中，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是一个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方面。因为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它具有调节各代人生产和消费的功能。中国固然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但为避免走弯路，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十分重要。

在世界范围内，老年保障可分为三种模式：以社会保障为主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保障制度的模式和城乡二元老年保障模式。目前，世界各国养老保障的组织制度概括起来主要有：国家统包制度、自我保障加国家资助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同样，在世界范围内，老年保障的基金也可分为三种模式：现收现付型、全基金型和半基金型。

我国过去对于老年保障问题的研究虽然缺乏系统性，但是“老有所养”、尊老、敬老、爱老的思想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从历史的观点看，我国老年保障主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上世纪 50 年代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同样具有鲜明的城乡二元性。总的说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养老社会保险的模式是部门分割，现收现支。就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而言，总的来说存在如下几大问题：一是养老保障的范围太窄，覆盖率太低；二是运行机制不合理；三是不同单位的养老负担畸轻畸重，不利于公平竞争；四是退休金固定不变，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使退休人员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几十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对我国的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模式毕竟是在产品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这种国家保险模式已越来越

不能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革。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老年社会保障的需求都将不断地扩大，而目前我国的老年人口供给模式将无法适应这一日益扩大的需求状况。从国际经验看，人口老龄化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人口老龄化高峰的至少前 20—30 年，必须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进行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倘若我们错过这 20—30 年的大好时机，没有在城乡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必要的经济储备，那么，几十年后，这一失误会使我国陷入另一个困境。因此，改革或建立中国城乡老年保障制度已经迫在眉睫，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社会战略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养老保障问题本身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单纯为养老而发展养老保障事业，而应将养老保障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事业的整体结合起来考虑，通过合理的运行机制将养老的压力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应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为发展养老保障事业的基础，以养老社会保障事业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从而实现养老保障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那种简单地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作法，无疑会顾此失彼，治标却治不了本。

四. 中国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真领会这一重要论断，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特征和时代使命，增强全党的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未来二十年，我国的发展面临诸多有利的机遇。如何从人口转变的角度理解未来二十年的机遇期？人口转变的机遇期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如何才能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期？这些问题是人口学工作者急需回答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本节试图用“人口机会窗口”理论，分析未来二十年中国人口转变为发展带来的机遇，结合国际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未来二十年加快发展的重要性和调整人口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1. 人口发展机遇期的含义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生育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孩子数量下降的速度会快于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个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才会逐步超过未成年人口，从而进入老龄化社会和随之而来高龄化社会。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且这个时期在人口进入高龄社会之前，会持续很长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家则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 (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或“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Bonus)⁸。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

⁸ 见 Bloom, D.E. & Williamson, J.G., 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king Paper 6268. Cambridge, M.A. NBER.

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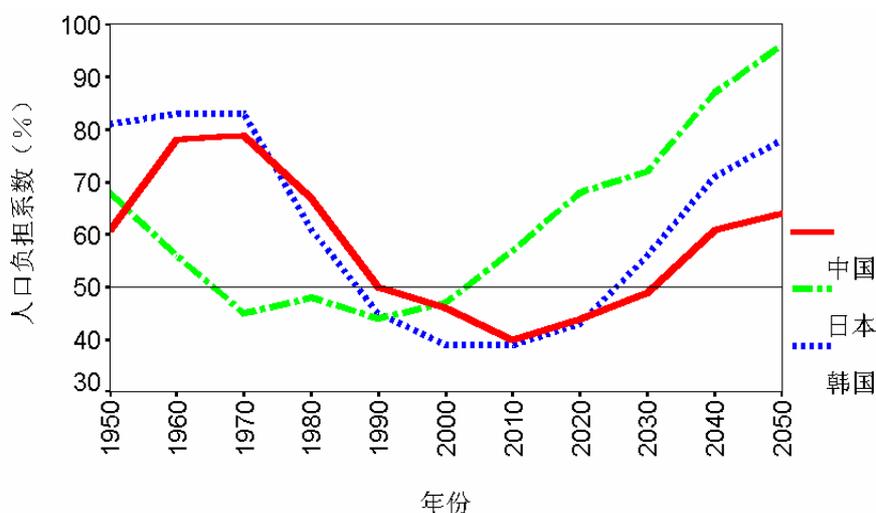
“人口机会窗口”一般可以持续开放 30 年到 50 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但是人口机会窗口持续的时间却相对较短。反之，生育水平缓慢下降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相对较长，但是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不够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

表 5：中国、日本和韩国人口负担系数和人口老龄化状况百年比较（单位：%）

年份	中国		日本		韩国	
	人口负担系数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人口负担系数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人口负担系数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1950	61	4.5	68	4.9	81	3.0
1960	78	4.8	56	5.7	83	3.3
1970	79	4.3	45	7.1	83	3.3
1980	67	4.7	48	9.0	61	3.8
1990	50	5.6	44	12.0	45	5.0
2000	46	6.9	47	17.2	39	7.1
2010	40	8.1	57	22.3	39	10.1
2020	44	11.5	68	27.9	43	13.5
2030	49	15.7	72	30.0	56	20.0
2040	61	21.4	87	34.1	71	25.3
2050	64	22.7	96	36.4	78	27.4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200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0 Revision, Volume I, New York, 2001.

图 4：中国、日本和韩国人口负担系数百年比较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上世纪后 50 年和本世纪前 50 年，我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即 0-14 岁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负担人口之和与 15-64 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呈现出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二十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如果以 50 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一个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 1990 年开始，到 2030 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 40 年。从 1990 年开始，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到 50 以下，一直到 2010 年前，人口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到 2010 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 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 2030 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 1990 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通过以上预测和分析，从人口结构变动的角度看，未来二十年我国处在人口转变的“人口机会窗口”开放最宽的时期，这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口条件。

回顾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人口问题始终至关重要，因为人口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试想如果当初我国没有及时审时度势地将计划生育工作的确定为基本国策，提出“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⁹，如今的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 15 亿，今天的小康社会谈何而来。应该说，中国之所以能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发展成绩，正确的人口发展战略功不可没。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为推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下，我们又迎来了一次人口转变带来的新机遇。这是一个收获的时期，也是多年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回报。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好未来二十年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机遇加快发展，如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与时俱进地调整现有的人口发展战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2. 人口发展机遇期的国际比较

在近期出版的 2002 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2002 年《世界人口状况》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人口机会窗口”的概念，及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发展报告》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⁹。世界银行的报告特别指出，东亚国家通过人力资源投资和相关的战略调整，已经开始从下降的人口负担系数中受益。那么，东亚国家是如何抓住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促进经济发展的呢？

一般说来，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 响。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人口的比较优势才是至关重要的。19 世纪早期到 20 世纪上半叶，东亚各国不是成为外来势力的殖民地，就是某种超强力量的附属者，其自身的政治经济独立地位一直无从谈起。而且东亚地区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人口密度高，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因此，国际上多数观察家对该地区的发展前景不乐观。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以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为核心的东亚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多年来，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并且持续 30 多年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理论研究的成果和东亚的实践都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有

⁹ 见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 和 UNFPA, 2002,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利时机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¹⁰。

日本的发展经历证明了总人口负担系数的下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三个人口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和老龄化相对缓慢，使日本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70左右下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人口机会窗口”时期；第二是日本战后“婴儿热”时出生的人口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第三是日本狠抓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在一代人的成长期间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还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时机，从1955年开始，经济增长驶入了快车道，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起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日本经济多年的增长率超过了10%，见表5，表6和图4。

表6：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期比较

国家或地区	高速增长期	高速增长年数(年)	GDP增长率(%)	高速增长后期	GDP增长率(%)
中国	1978—2000	22	9.52		
日本	1955—1973	18	9.22	1973—2000	2.81
韩国	1962—1991	29	8.48	1991—2000	5.76
新加坡	1965—1984	19	9.86	1984—2000	7.18
台湾地区	1962—1987	25	9.48	1987—2000	6.59
香港地区	1968—1988	20	8.69	1988—2000	4.14

资料来源：转引自许宪春，2002年。

从统计数据上观察，“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是总人口负担系数快速下降的时期，经济的“一高”和人口的“一低”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恰恰证明了人口负担系数的下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积极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的人口增长严重影响韩国社会经济发展。1961年，韩国把家庭计划确立为一项国策，并把人口控制目标规划纳入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成功的家庭计划政策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开启了“人口机会窗口”。韩国及时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积极调整人口发展战略，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步入新兴工业国家行列。在30多年时间里，韩国经济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跃升至1995年的1万多美元，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300年的历程，创造了令人称羨的“汉江奇迹”。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人口快速转变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起飞的条件。这种结论不无道理，经济的起飞的确加快了人口转变的进程。特别是对稳定和巩固已经下降了的生育水平至关重要。但是，打破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劣性均衡陷阱”闭环运行僵局的，首先是政府的干预，是适合本国国情的人口发展战略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东亚各国经济起飞的历史经验也说明，在把握人口机会窗口的战略

¹⁰ 见 Andrew Mason, 1997, 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Asia-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Hawaii.

上，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相反，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过分强调市场对人口问题的自由调节，忽视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面对人口转变的机遇期，没有及时作出战略和政策反应，使得这些国家没有在人口转变带来的发展机遇期间出现快速增长现象。面对同样的机遇，条件不占优势的东亚国家的经验和资源条件良好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训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3. 人口发展机遇期的重要性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都持续了 20 多年左右，并且高速增长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也都比较接近。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例如，日本的人口负担系数于 1970 年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 45，近些年徘徊在 50 左右，从表面看，仍然在人口机会窗口范围内。但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给日本带来的机遇已经消失了，原因在于日本人口已经严重老龄化，开始进入了高龄化社会。

从表 3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于 1970 年进入老年型社会。到 2000 年，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 17.2%，比中国和韩国高出 10 多个百分点。也正是在日本进入老龄社会的 1970 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从统计数据上看，1970-2000 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21%，1980-2000 年间仅为 2.61%。特别是随着近年来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价格的提高，1990-2000 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仅略高于 1%¹¹。日本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会从 1960-1970 年间平均每年 10% 以上下降到今天如此低的水平？难道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衰退的同时出现是巧合吗？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翔实的定量研究说明人口机会窗口的逐渐关闭对日本经济滑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度相关的。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日本的情况更不容乐观。预测结果表明，20 年后，日本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会提高到 27.9%，而到本世纪中叶会进一步提高到 36.4%。届时，高额的社会保障税收和福利支出将会严重拖累其经济发展，见表 6。

日本的今天应该成为我们明天的一面镜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1978-2000 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52%。这一增长率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大致相同。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和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必然会出现减速的情况。事实上，最近 10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九五”计划期间比“八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最近两年又比“九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以 2010 年为界线，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在未来 20 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在前 10 年和后 10 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在 2001~2010 年间，劳动力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人口负担系数继续下降，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是实现高速增长的大好时期。2010 年以后，劳动力增长将逐步放缓。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速度的加快，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增长会较快，人口负担系数开始由降转升，社会负担加重，国民储蓄倾向和总投资率可能会逐步下降，而公共开支的增加和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将引起的税收负担加重。这些因素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由此可见，“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更为关键。

¹¹ 见许宪春，2002 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展望”，《研究参考资料》2002 年第 12 期，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主办。

同本世纪前二十年相比，2020 年以后经济增长的人口环境将更为不利，届时的人口机会窗口会变得很狭窄，并逐步关闭。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阶段出现的，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 GNP 一般在 1 万美元上下，而中国仅为 850 美元；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太快，而欧洲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¹²。这两个因素意味着，中国既没有欧洲那样的经济实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要求的社会福利的增长，也没有时间来从容地消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养老社会问题。

2001 年 8 月，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有关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趋势将引发劳动力减少、储蓄率降低、消费下降以及老年人福利负担加重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使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衰退。面对我国特殊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4. 人口发展机遇期的矛盾性

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包括体制背景和人口背景，展望未来 20 年，我国发挥“人口机会窗口”效应的难度很大。我们之所以说“人口机会窗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是因为总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较高，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没有区别，同样是负担人口。失业不仅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巨大损失，而且会使未来负担更为沉重。然而，目前的就业问题是困扰全社会的难题，而且就业问题将一直存在于人口发展机遇期。就业问题若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是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还将危及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更谈不上人口机会窗口效应了。

再进一步观察，如果未来老龄化和失业并存，就会使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优势成为劣势，因为可以创造价值的失业人口不但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且需要消耗社会财富，不但不能为他们的未来提供储蓄，而且要与老年人口“争夺”社会保障资源。这两种力量将迫使中国政府运用有关财政和税收政策，把用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提供社会保障中来，以缓解这两股力量对中国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震荡。但是要解决中国的失业和养老问题，又尤其需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高速消耗和高速增长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钳制关系。如果解决不好，未来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长期衰退的陷阱。

另外两个迹象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中国人口抚养比的优势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原因是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亚洲人口大国的人口抚养比最低时期也将在中国之后相继到来。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相似，特别是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将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第二：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加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也会逐步削弱总人口负担系数的优势。美国休伊特全球咨询公司前不久结束了本年度对亚太地区公司企业员工的工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02 年中国大陆公司员工的工资增幅最大¹³。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下降。

¹² 见魏甫华，2002 年，“中国经济的‘皱纹’”，《财经》杂志 2002 年第 34 期。

¹³ 见《青年参考》2002 年 11 月 27 日。

党的十六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明确提出了党在新世纪头 20 年的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对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关键的不仅是要能够敏锐地发现机遇，更重要的是，各行各业各地区都要善于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准确把握，紧紧扭住不放，最终实现加快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适时调整相关的发展战略，把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到实处，努力实现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发展、新突破。要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关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要求，深入研究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明确新世纪的奋斗目标，理清发展思路，开创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新局面，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五.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

党的十六大就是动员和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宏伟的蓝图，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战略，那就是在未来的二十年里，集中力量，把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再向前推进一步，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显著特点是，不但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人的发展；不但注重物质文明，也注重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不但提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任务，也突出地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奋斗目标。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任务的承担者，也是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最终受益者，这是强调消费的“人口论”和强调生产的“人手论”的统一。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在物质文化供给有限的条件下，人口数量过多会影响生产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口素质低会影响生产的效率和消费模式的改善，人口结构失衡会影响生产的稳定和消费公平。因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应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无论如何，中国在下个世纪的上半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

1. 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硬道理”

日本著名学者的黑田俊夫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人口转变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日本在 60 年代时的情景酷似。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 25-30 年。黑田俊夫强调指出，日本正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时，利用人口的负担系数比较低的机会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从而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

有利时期，定会使其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¹⁴。

尽管如此，即使我们不能期望在“黄金时期”，取得如日本那样的经济成就，但我们仍有机会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利用黄金时期给我们提供的机会，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是能否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关键，因为在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起决定和主导作用。如果生产上不去，就谈不上改善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的多少，决定了可供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只有生产发展了，被用来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物质财富的种类和数量才会充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实力应付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国际经验也证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社会保障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的增长，也不是医疗技术不断的进步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失业问题造成的。如果失业率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社会福利支出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更是要求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 人口战略的调整是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机会是潜在的，而挑战是现实的，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看，今后二十年人口机会窗口给我国带来的比较优势得天独厚，但是挑战严峻。必须抓住机遇，适时调整相关的发展战略，才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从人口机会窗口中受益，必须要做的是对传统的相关发展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回顾东亚各国经济起飞的历程，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受益于人口转变的带来的机遇，主要是政府能够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人口刚刚进入老年型，在制定我国长期的人口战略规划时应避免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育率过高造成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是生育率过低造成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过快。也就是我们要在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水平之间进行权衡，找到使两者都适度的均衡点。这也是我国人口政策实现平稳过渡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人口政策应由现在的“二维”，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为“三维”，即再加上一条“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人口逐渐走向现代化之路：人口数量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年龄结构优化。

尤其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一讲人口问题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负担，是个沉重的包袱。但辩证地看，人又是一种最活跃的生产力，如何把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化成有效的人力资本才是最重要的。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力人口比例较高的“人口机会窗口”机遇期，如果不能充分发挥这一稍纵即逝的比较优势，机会就可能转化为挑战。人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没有实现就业的有劳动能力人口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同样要消耗社会财富，加重社会的负担。因此，提高我国的就业率是非常重要的。

¹⁴ 见黑田俊夫，1993年，“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1993年第4期。

要而紧迫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民生的角度看，就业充分不充分不仅直接影响现在的经济发展，而且关系长期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努力提高我们现在的就业率。我国未来 20 年劳动力供给持续大于需求的确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就业不充分实际上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政府要千方百计地为提高就业率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就业率从来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解决就业问题一是要靠政府给政策，二是要靠市场给机会，三是要靠就业者提高素质。对于实在没有能力就业的人口必须要有社会保障作为底线，否则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的局面。

3. 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是避免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条件

由于我国长期的“二元化”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城乡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差距。城镇老年人口的经济供养主要来源政府和单位，即以社会供养为主，家庭供养为辅；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供养则主要来源于子女和个人，即以家庭供养为主，以社会供养为辅。这种经济供养格局的差异要求我们在建立养老保障体系时，要区别对待城市和农村的情况。但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老年社会保障的需求都将不断地扩大，而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供养模式将无法满足这一日益扩大的需求状况。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致贫。因此，尽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迫在眉睫。特别是为了占总人口 75% 的农村人口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既重要，又紧迫。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样，在一个老年人的生活得不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也不能称之为全面的小康社会。

从国际经验看，人口老龄化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人口老龄化高峰的至少前 20—30 年，必须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进行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由于 60 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在 2025 年前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届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会突然加速而逐渐达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我们的准备时间恰好有二、三十年。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倘若我们错过未来 20—30 年的大好时机，没有在城乡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必要的经济储备，那么，几十年后，这一失误会使我国陷入另一个困境。因此，建立、改革和完善中国城乡老年保障制度已经迫在眉睫，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社会战略问题。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两者是良性互动的；而不顾社会福利供给能力，提供过高的社会保障，或无视整个社会的需求只为一小部分人提供过低社会保障，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如诺贝尔经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特别突出强调的那样：“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继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4. 就业制度要兼顾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一个人退休后还要生活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不考虑法定退休年龄的强制性，决定一个人是否退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如能从退休金和社会保险中得到多少经济收入。其他因素，如健康、职业等也很重要。退休年龄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退休年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器”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退休年龄要灵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存在许多提前退休的老年人口。根据 2000 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城市共有 31.6% 的老年人提前退休，其中男性占 58.9%，女性占 41.1%。男性平均提前 6.6 年退休，女性为 6.1 年。从退休的时间看，提前退休和我国企业改革密切相关。1984 年以前，提前退休比例极低，1985 年以后逐年呈

上升趋势，1994 年提前退休的比例最高，目前基本稳定。提高退休年龄可以降低当期支付规模。一般地，在平均预期寿命和保障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退休年龄提高、则平均享受养老金年限就缩短，养老金负担就能降低。据国际劳工局估计，退休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养老金负担能下降近 50%。我国现阶段男性 60 岁和女性 55 岁的退休年龄规定于 50 年代初，当时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 49 岁，而目前已上升到 70 岁左右。因此在我国提高退休年龄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当然，提高退休年龄在短期内有可能加大就业压力，但就中长期而言，提高退休年龄无论是对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转制，还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都是有益的。只是在具体操作中可采取一些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协调短期中长期战略等办法，尽量做到在减轻转制成本的同时又能均衡劳动供求关系，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老年人口自我供养的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的角度看，劳动力退休后的再就业应受到鼓励。因为老年人是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之中蕴藏着无限的经验和智慧。特别是我国的“年轻老人”的数量巨大。在我国的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工作岗位的结构性空缺，而这些空缺可能是非老年劳动力不愿意或不能补充的。有人担心，老年人口的再就业会与劳动力年龄的人口就业产生摩擦，从而造成新的矛盾。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重新就业的老年人口并非挤占一般的就业机会，他们主要是填补社会经济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职业空缺，这类工作往往是年轻人不愿干或干不了的。因此，两个方面完全是可以协调一致，互为补充的。总之，在调整我国就业政策时，既要考虑到我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不断膨胀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同时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再就业的要求和必要性，兼顾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不同特征和要求。

5. 税收政策要适时调整

中国正处于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过程中，转型时期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问题倍受国内外关注，在贫苦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有相当比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的作用，以解决效率问题；二次分配主要依靠政府的作用，以解决公平问题。如上所述，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制度体系的变化，政府将担负更多的养老的责任。就一个国家的政府供养负担人口的能力而言，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齡化将使总抚养比上升，意味着被负担人口的增加和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意味着纳税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样，如果在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齡化而导致的总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会使政府的税收总量减少。这会使我国一方面面临对政府财政支出需求加大，另一方面面临对政府财政收入供给减少的不利局面。因此，为保证政府税收水平的提高或不变，要在不同的时期，依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税率的高低。

社会保障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主要财源。目前，全世界有 17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其中近 100 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法国、德国、瑞士、丹麦、瑞典等国，社会保险税已成为头号税种。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会保障工作的关键就是资金的问题。只有强大的财政经济实力，才能为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但是，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近几年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2000 年的缺口为 400 多亿元，2001 年财政补贴也高达 816 亿元，其中收不抵支的省份多达 20 多个。由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实现两个确保

的要求，因此，财政每年加大了补贴的力度，财政支出连年增加。所以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角度讲，要使社会稳定，必须有稳定的筹资渠道，才能有强劲的保障实力。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值得借鉴。例如，有些国家在感到人口老龄化对政府的财政压力时才想起调整税收政策，遭到了劳动力人口的反对。不但难以实施，而且影响代际之间的关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尚不严重的情况下，适时适度地提高有关税率，对解决今后人口老龄化严重时带来的问题是有利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收入所得税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有庞大的税源，但却有相当一部分的税款流失。为了减轻贫富分化问题，政府可以考虑对购买私人别墅、高级轿车、吃黄金宴等奢侈消费征税，并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资金的专项来源。

当然，不论采取哪种“费改税”方式，都存在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科学合理确定税率，过高的税率会加重企业和职工的负担，过低则会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降低社会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二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税务部门要疏通渠道，准确掌握企业和职工的纳税能力。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成功与否。不管原来的社保机构怎样改，一个负责统筹使用社会保障基金健康运行的组织机构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国家应有一套严密的监管制度，既避免滥用，以保证投资安全，又要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让这笔钱为公众发挥更大作用。

6. 人口城镇化要有序地加快

我国城镇的人口转变不仅比农村早，而且也更快。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表现出了强大的人口老龄化态势。另一方面，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那么，城镇将很快面临人口过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由于我国人口总数和劳动力总数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增长，所以，那种主张用调整城镇人口生育政策的手段增加年轻人口来缓和城镇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在调整城镇生育政策使其生育率回升的选择不可行的情况下，改变城乡人口的分布格局，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是改善城镇人口年龄结构，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的有效手段。这既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趋势，也是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导向所在。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只是解决城镇人口过度老龄化问题的一种人口经济学途径。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种转移的后果。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问题时都认为，由于相对较贫困落后的农村释放的剩余劳动力的“推力”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拉力”，使大批的农民源源流入城市，造成城市地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加深和突出，表现为棚户区的公开失业并产生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回推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局部地区和季节性的紧张状况。其后果是农村生产效率的下降，农业发展停滞状况加剧。据此，发展经济学认为，应注意发挥比较优势，不能轻易放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应尽力减轻城乡之间的经济机会不平衡的状况；要发展农村工业，把经济活动和社会投资引向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

迁移对缓和地区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可行的，但不是万全之策。当迁移的人口成为老年人口时，地区性人口老龄化问题会突然加剧。因此，我国在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时，要变“无序化”的盲流为“有序化”的转移，要综合考虑人口、经济和城乡的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

7. 公共卫生体系要逐步建立和健全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表明，老年人口的医疗保健费用远比年轻人口的高，因为老年人非传染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症、癌症和脑溢血的发生概率相对较高。这一现象在中国同样正在发生。1998 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表明，我国城市人口慢性病患者率自 1993 年逐年增加，到 1998 年已达 15.75%，而城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慢性病患者率则为 51.8%；在城市地区，失能老年人口达到了失能人口总数的 60%。国际有关研究证明，老年人普遍认为医疗成本的上升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¹⁵，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口死亡年龄的中数(the median age at death)已经超过了 60 岁，这表明中国的健康问题主要出现在老年人口上，而非青少年人口¹⁶。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疾病发生模式、健康保健需求、死亡原因和健康存量的变化，目前的保健系统和保健基础设施应随之加以改革，以满足不断增长和变化的老年人口的需求。然而，以前的研究表明健康保健系统经常是缺乏足够的准备以应付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保健问题，如癌症、心血管病及老年痴呆症。而那些能对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正规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数有限¹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速度远比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速度快，因此如何调整医疗供给以适应新的需求已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否则，在没有医疗保障的人群中会形成“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恶性循环。

在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老年人的健康和保健负责，医疗基本是免费的，并且医疗网络健全，覆盖面较广。即使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也有“赤脚医生”。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政府动员社会资源能力的下降，乡村集体医疗体制和资源遭到了削弱和破坏，合作医疗制度迅速衰落，农村公共保健网不断萎缩，加之近年来医疗价格上涨，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提升速度有所放慢，生命指标改善趋缓，使农村人口健康状况的提高受到了阻碍，甚至被认为是处于平台期¹⁸。

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个体功能下降，决定了老年人在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费用应该有相应提高。然而由于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不佳，决定了许多老年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其中出现了“有病不敢医、不能医”的现象。由于收入水平的制约，老年人往往将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较为忽视健康投资对改善自身福利的重要性，尽可能地压低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这一点在低收入老年人群中表现更为突出。据调查，有 62.25% 的农村患者因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33.18% 的患者应就诊而未就诊¹⁹，突出地反映了农民支付能力低下的状况。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一般占贫困户的 30—40%，有的地方达 60%

¹⁵ 见 Eldermire D, 1997, “Ageing, Poverty and Health”, *People*, 1997 Aug-Nov: 6(2-3): 6-7.

¹⁶ 在比较年轻人口与老年人口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时，常用的指标是死亡年龄中数。5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死亡年龄中数在 20 岁以下，这意味着健康的主要问题在年轻人口身上。到 1990 年，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死亡年龄中数已经达到了近 60 岁，而非洲贫困地区的死亡年龄中数只有 5 岁左右。中东地区的死亡年龄中数在 25 岁以下。

¹⁷ 于学军，1995 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年 12 月出版。

¹⁸ 见杜鹰，2001 年，《关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中国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2000 年。

¹⁹ 见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的初步报告》，《中国卫生质量管理》，1999 年第 1 期。

以上，数量较多的贫困农民会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后腿，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就能减少以上情况的发生²⁰。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高和数量的增大，政府在退休人员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也在膨胀。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必然对中国的医疗消费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对此，我国的医疗保健部门应未雨绸缪，密切注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动态和老年人口对医疗保健市场的特殊需求，及时调整医疗卫生机构，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各级医院已经形成了网络，儿童医院、妇产医院也遍布全国各地，然而，老年医院的数量却非常有限，这种状况如不改善，将很难满足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对医疗保健的需求。

8. 社会要提倡和谐的代际关系

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活动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一生中经济行为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人的生命周期总是从未成年年龄阶段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小于消费；而后是劳动力年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大于消费；最后是老年年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再次小于消费。为了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处在生命周期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人口需将其净产出（产出和消费之差）的一部分分配给处在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未成年人和第三阶段的老年人。无论在什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生命周期三个阶段中的这种分配关系都是一样的。

老年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当他们年老体衰时，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1999年国际老人年，联合国提出的主题就是：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关注老年人口，提倡公平、和谐的代际关系，使他们在温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安度晚年，是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贯彻和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先秦儒家在推行以“仁政”治理国家的理论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以运于掌上”。这种社会公德应该为全社会所承认、所接受，并且逐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和伦理关系。因此，要将尊老、敬老纳入社会道德建设之中。

9. 家庭要继续发挥养老功能。

为了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老年保障问题的挑战，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机构，纷纷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分担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和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国家或机构没有一个达到预期目的，家庭养老的传统功能无法被完全替代。正因如此，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强调家庭养老保障的作用。一方面人们承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的核心化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趋势；另一方面，人们也强调，必须发挥和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原因主要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现实使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承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压力。某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国家或前苏联的福利计划，结果无不遇到重大的财政困难。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家庭在养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政府应从宏观上采取一些对策，例如：提倡尊老、敬老、爱老、养老的优良传统，对老年人及其有老年人的家庭提供必要的优惠政策，对那些照顾无自理能力老年人的家庭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助，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²⁰ 见刘翠霄，“为九亿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法制日报》，2003年3月20日。

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还处在较低的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要。事实上，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养老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即使社会保障十分健全，社会化服务程度很高，家庭的养老功能在中国也不会完全被社会所替代。家庭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互补，二者将会长期并存，特别是在有着传统家庭文化的中国。

按照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民族传统，大部分老年人都喜欢选择不离开居住社区的养老方式。因此，大力倡导以居家养老为主、以机构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充分发挥社区服务中心资源优势，促进居家养老社会化，既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又有利于倡导互助友爱，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随着老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到社区，不仅养老金由社会发放，老人的养老也基本上由社区与家庭共同承担。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10. 老年人要加强自我保护和自我养老意识

老年人口是一个脆弱群体，需要特殊保护。传统上，中国城市老年人口主要靠公共转移，农村老年人口主要靠私人转移来维持老年生活支出。从调查结果看，目前的老年人口缺乏养老危机和独立自主的养老意识，依赖思想比较普遍。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和2002年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调查中老年人关于养老问题的回答发人深思。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终身准备的首选方案顺序均为子女养老、自己储蓄养老、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城市49.8%的老年人在养老终身准备中把“钱花在子女身上，老了靠子女”作为第一选择，而仅仅只有2.2%的老年人将“商业保险”作为首选方案。在农村有80.2%的老年人将“钱花在子女身上，老了靠子女”作为第一选择，选择“商业保险”的仅为0.9%。表7是2002年四省农村调查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目前大约有60%的老年人认为应该依靠子女养老，其中又有2/3的老年人倾向于儿子养老，只有1/3的老年人同意依靠女儿养老的观点。同意靠自己养老的老年人不到一半，而同意依靠政府养老的老年人则不到1/3。参加了各类保险的老年人口只有5.6%。

表7：老年人口养老预期 (单位：%)

问题	是	否
是否同意养老靠子女的观点?	60.5	39.5
是否同意养老靠儿子的观点?	63.3	36.7
是否同意养老靠女儿的观点?	35.2	64.8
是否同意养老靠自己的观点?	44.4	55.6
是否同意养老靠政府的观点?	31.4	68.6
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	5.6	94.4
是否听说过养老保险?	28.1	71.9
是否因为没钱参加养老保险?	53.9	46.1
是否觉得参加养老保险不可靠?	8.8	91.2

资料来源：根据四省农村调查原始数据计算结果。

在新的形势下，依靠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养老问题，政府、市场、单

位、社区、家庭和个人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依赖关系。为此，老龄工作部门和新闻媒体应该引导全社会各个年龄组的人口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不等不靠，逐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目前的老年人依赖家庭子女养老既是多年的传统，也是现实的反映。但是，对于未来的老年人口来说，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无论是城市还农村老年人口都不能只依靠转移收入，必须增强自我创收能力，使养老保障的收入来源多元化，才能使未来的养老更可靠和安全。

六. 结束语

党的十六大就是动员和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宏伟的蓝图，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战略，那就是在未来的二十年里，集中力量，把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再向前推进一步，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过去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问题始终至关重要，因为人口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

1981年11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为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体制改革、观念更新，中国人口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的中国人口不但有数量问题、质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人口的结构问题包括年龄结构问题、性别结构问题、分布结构问题，等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口结构问题会越来越显性化而成为众多人口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就要求我国的人口政策进一步完善，即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将优化人口结构的问题提到政策层面给予关注和解决。

展望未来，我们面临挑战，也有难得机遇。我们只有顺势而上，加快发展，才能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问题。与20多年前建设小康社会时的背景相比，如今的国际形势变了，表现在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国内的形势变了，表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口形势变了，表现在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转变为低生育水平时期。这些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背景和人口形势，要求我们要调整人口战略思路。唯有与时俱进地有针对性地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人口战略方案，才能发挥“人口机会窗口”效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一个新的、有利的人口环境。

参考文献

- 国家统计局，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的初步报告》，《中国卫生质量管理》，1999年第1期。
-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
- 杜鹰，2001年，《关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中国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2000年。
- 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2002年，“中国经济未来50年：发展趋势和政策取向探讨”，《新经济导刊》2002年5月号。

- 吕书正, 2002 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载于《求是》杂志 2002 年第 20 期(总 345 期), 2002 年 10 月 16 日出版。
- 王小鲁, 2000 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 载于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出版。
- 蔡昉, 2001 年, 《2001 年: 中国人口问题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7 月出版。
- 许宪春, 2002 年,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展望”, 《研究参考资料》2002 年第 12 期,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主办。
- 黑田俊夫, 1993 年, “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学刊》, 1993 年第 4 期。
- 马杰, 2001 年, “日本老人看护保险制度的由来”, 《国际金融报》(2001 年 12 月 17 日第四版)。
- 于学军, 1995 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出版。
- 于学军, 2001 年, “‘十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前瞻性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1 年第 1 期。
- 于学军, 2003 年, “从上海看中国老年人口的贫困与保障”, 《人口研究》2003 年 3 期。
- 于学军, 2003 年,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年第 1 期。
- 魏甫华, 2002 年, “中国经济的‘皱纹’”, 《财经》杂志 2002 年第 34 期。
- Andesson, B., 2001, Scandinavian Evidence on Growth and Age Structure, *Regional Studies*, Vol. 35, No.5.
- Birdsall, N & S. Sinding, 1998, Report on Symposium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vember 2-6, Bellagio, Italy.
- Bloom, D.E. & Williamson, J.G., 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king Paper 6268. Cambridge, M.A. NBER.
- Andrew Mason, 1997, 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Asia-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Hawaii.
- United Nations, 200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0 Revision, Volume I, New York, 2001.
- World Bank, 1993,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18.
-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
- UNFPA, 2002,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 JARC, Aging Japan, 2003.
- PRB, 2003, World Population Datasheet.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3,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Database, 2003.
- Eldermire D, 1997, “Ageing, Poverty and Health”, *People*, 1997 Aug-Nov: 6(2-3): 6-7.
- Banister, J., 1987,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sgupta, Partha, 1993, An Inquiry into Well-Being and Destitu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